

制度与创业：创业研究中制度理论的拓宽与情境化

□ Eric Zhao (赵雁飞) 李 涌

摘 要：本文评论了 Hitt 和 Xu (2019) 的论文，该论文总结了制度理论与创业交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我们同意两位作者的建议，即学者应该发展一套理论上严谨且全面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对创业战略和绩效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指出两条未来的研究路径，希望这两条途径能够拓展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即当前许多制度与创业的交叉研究的基础。首先，我们讨论了近期关于制度逻辑和制度复杂性的研究，强调其在拓宽我们对制度的认识方面的潜力。其次，我们呼吁对创业研究中的制度理论进行更多的情境化研究。

关键词：制度；创业；制度多中心主义；制度逻辑；制度复杂

Hitt 和 Xu (2019) 挑战了将制度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看得过于简单的观点，他们的这篇评述和研究议程出色地总结了制度理论与创业的交叉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指出三大专题领域中令人兴奋的研究机会：①制度分为多种类型（例如正式和非正式），且存在于多个层级（国家、区域、小地方/城市）；②单一制度能够且已经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但是多重制度的组合效应往往更复杂且更具影响力，却尚未被充分探讨；③制度不是静态的，而是会随着时间而演变，也许在新兴经济体中演变更快。我们赞赏这一努力且同意作者的观点，即有必要发展一套理论上严谨且全面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对创业战略和绩效的影响。在这方面，将制度视为多中心的、分为不同类型和层级，以及关注制度的组合效应，都对我们思考制度如何塑造创业机会以及促成和约束创业行动有重要启示。

然而，我们注意到，文中评述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围绕更理性的经济学视角展开的，而且往往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的（North, 1990; Ostrom, 2005）。这篇评论的重点在于引起人们对植根于社会学和组织理论的丰富制度理论研究的关注（DiMaggio & Powell, 1983; Meyer & Rowan, 1977）。具体地，近期围绕制度逻辑视角

(Thornton et al., 2012) 和制度复杂性 (Greenwood et al., 2011) 的令人振奋的研究, 直接聚焦于由多种制度秩序构成的社会概念、制度逻辑之间的竞争或互补关系, 以及两者对组织战略和反应的影响。遵循这一传统的学者已在理解制度逻辑和制度复杂性如何影响创业行为和结果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Cobb et al., 2016; Zhao & Lounsbury, 2016; Zhao & Wry, 2016)。我们认为将这一研究路线引入制度经济学方法能够扩大研究机会, 并鼓励今后在制度与创业交叉领域的研究中更充分地参与当代关于制度逻辑和制度复杂性的研究。为此, 我们选择性地回顾了最近的一些文献来论证制度逻辑视角在指导创业研究方面的价值。在此过程中, 我们强调了该方法如何有助于在研究 Hitt 和 Xu (2019) 讨论的三大专题领域时带来新的洞见。

此外, 我们发现 Hitt 和 Xu (2019) 过于强调促进制度多中心主义的概念, 甚至超过了对创业作为情境的实质性讨论 (尽管鉴于篇幅限制这是合理的)。因此, 除了注意制度逻辑视角和制度复杂性可以如何为创业研究提供洞见外, 我们还将更广泛地讨论在创业研究中扎根和情境化制度理论的重要性。

一、超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二分法, 将社会重新定位为一个制度间系统^①

Hitt 和 Xu (2019) 对制度多中心性 (insti-

tutional polycentrism) 的关注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超越了将制度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过于简化的分类。根据制度多中心理论, 制度环境不是由单一、独立的制度构成的, 而是以多样性为特征——是不同类型的相互关联的制度的汇合 (Kogut & Ragin, 2006; Ostrom, 2005)。因此, 制度是复杂和多面的, 源自多个规则制定中心, 如政府、协会和社区 (Batjargal et al., 2013; Li et al., 2019; Ostrom, 2010)。这些不同制度的汇合, 通过其制度间的动态作用和相互强化, 对组织的行动和结果 (例如, 创业者的网络结构、新创企业成长、新创企业形成率、创业融资) 施加了与单一制度相比更强烈的、本质上不同的影响 (Batjargal et al., 2013; Ostrom, 2005)。

虽然制度多中心理论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论化和衡量国家间不同的制度条件, 以及这种制度变异 (institutional variations) 如何系统地塑造组织的结构和战略, 但其植根于新制度经济学使其焦点主要限制在了经济和政治制度 (例如, 政治风险、规制性制度) 与非市场机构 (例如, 协会) 上。根据这一理论, 制度变异主要通过塑造资源流动与构建制裁和激励机制、进而影响到组织行为和结果。制度多中心理论关注的是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两者对组织的实质性影响, 因而对文化和对组织关注和认同的影响关注不足。文化被认为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秩序, 主要建立在与以下六个维度相关的共同理解和假设之上, 即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不确定性规避、

^① 制度间系统, inter-institutional system。

长期与短期取向、放纵与约束 (Hofstede, 1980; House et al., 2004; Li & Zahra, 2012)。这一概念认为文化是由一组相似的规范和广义的价值体系组成 (Hofstede, 1980)。该情况下, 文化充当着一种在各情境下都具有广泛影响的强大力量, 意味着基于若干预设文化维度的文化影响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的, 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塑造创业过程中的丰富文化动态 (Lounsbury & Glynn, 2001, 2019)。

就其本身而论, 围绕制度多中心主义建立的理论反映了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深刻渊源。在新制度经济学中, 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对人际互动的约束” (North, 1990)。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减少经济交换中由于环境复杂性和个人计算能力限制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制度创造了经济中的激励结构, 组织的建立则是为了利用给定制度框架内提供的机会集来实现财富最大化或其他目标。制度随时间推移而演变, 且制度的变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在解释面临约束的行动者行为上, 新制度经济学方法与简化论方法和理性选择假设高度一致, 即将制度概念化为提供约束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 (Bruton et al., 2010; Li & Zahra, 2012; Lounsbury & Glynn, 2019)。

相较于制度多中心理论, 制度逻辑视角排斥将行为工具化的理性选择方法, 认为制度是“既制约又促成各种行为的社会文化建构” (Lounsbury & Glynn, 2019)。制度逻辑视角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将社会概念化为一个由市场、企业、职业、国家、家庭、宗教和社区等多种制度秩序构成的制度间系统 (inter-institutional system) (Thornton et al., 2012)。每种制度秩序都具有独特的组织原则、实践和符号, 这些原

则、实践和符号塑造个人和组织的身份, 集中他们的意图和关注点 (Grimes et al., 2019), 并影响他们的行动 (Thornton & Ocasio, 1999; Thornton et al., 2012)。个人和组织处于这些不同制度秩序的范围之内, 受到时而不兼容、时而互补的组织行为指导原则和规定的制约 (Zhao & Wry, 2016)。当个人和组织面对来自多种制度逻辑的不兼容规定时, 他们面临着制度复杂性 (Greenwood et al., 2011)。虽然制度复杂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挑战 and 张力, 但其同时也为创业行动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制度逻辑视角和制度复杂性是比较制度设计的强有力方法, 有助于揭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同的制度秩序构型, 以及这些制度秩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对制度的理论化更加全面和系统, 超越了经济和政治制度, 涵盖了各种制度秩序。同时, 这两种视角对于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不兼容性或互补性的关注, 赋予了行动者部分自主权, 即制度不仅约束, 同时还促成创业行动。

这种将社会作为一个制度间系统的概念化也蕴含着文化多元主义, 后者支持将文化作为“工具箱”的方法, 并将更广泛的文化积淀视为多种形式理性的推动者和战略行动的基础 (Spillman, 2002; Swidler, 1986)。文化可以提供关键资源, 而不是施加强有力的结构性约束, 企业家可以动员这些资源来构建最佳的独特身份 (Navis & Glynn, 2010; Zhao et al., 2017; Zhao et al., 2018) 并设法制定行动战略 (Lingo & O'Mahony, 2010; Lounsbury & Glynn, 2019)。在表1中, 我们总结了制度多中心主义和制度逻辑视角之间的主要差异。

表 1 制度多中心主义和制度逻辑视角的比较

	制度多中心主义	制度逻辑视角
理论根源	新制度经济学	社会学、组织理论
制度与社会聚焦的理论化	经济、法律/规制、政治制度；正式与非正式规则	各种制度秩序，如市场、国家、专业、宗教、社区、家庭
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既定的、约束个体行为并构建社交互动	制度和文化是“工具箱”，促成同时约束创业行动
制度间关系	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具有单独的和交互的效应	不同制度逻辑之间互补、反差或不兼容造成制度复杂性
实证策略	不同类型的制度汇总成为一个综合的测量；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交互效应	交互的和构型的方法
制度变化的动态	新法律的通过；规制的转变	不同制度逻辑的显著性变化；相关解释和集体性认知的变化

二、制度复杂性与创业
机会和行动

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一股采用制度逻辑视角和制度复杂性概念来研究创业相关主题的新兴研究潮流。多样且相互竞争的逻辑的共存已被证明能够创造创业机会和激励创业行动。例如，Marquis 和 Lounsbury（2007）的研究表明，大型国有银行对较小的地方银行的收购（即强银行行业逻辑的表现）引发了银行业专业人员的抵制，促使他们动员并创办社区银行以维护银行业的社区逻辑。因此，感知和利用“创业机会”并不是一个中立、客观的事件，而是嵌入在涉及竞争逻辑的、更广泛制度动态之中的事件。

一种制度逻辑也可能因制度秩序间不同的力量而产生不同表现，推动形成异质的制度环境构型（Zhao & Wry，2016）。这些异质的制度构型可能进而塑造对新创企业的生存和绩效十分关键各类资源流。支持该论点的是，Zhao

和 Wry（2016）发现的父权制，一种社会层面的逻辑，在不同国家的制度秩序中表现得不一樣明显。在制度秩序普遍较强的国家，企业家面临最强的约束，他们的创业行动也可能受到抑制。相比之下，在某些制度秩序较强（如家庭和宗教）而其他制度秩序较弱（如国家和专业）的国家中，由此产生的反差有助于引起人们对性别不平等问题关注，激发补救的努力，鼓励各类资源（如客户、贷款人员和政府支持）流入小额信贷领域。

除了直接塑造创业者的动机及他们所面临的机遇和约束类型之外，制度逻辑也会影响资源提供者的投资偏好和战略。例如，就小额信贷而言，商业供资者和公共供资者分别遵循独特的投资逻辑——金融逻辑和发展逻辑，且偏好支持不同类型的小额信贷组织，尤其是在平静的环境中（Cobb et al.，2016）。此外，东道国与市场与宗教信仰相关的两种制度逻辑，也被证明能单独和共同影响小额信贷组织从两类不同的供资者处获取资金（Zhao & Lounsbury，2016）。

除了这些跨国比较研究之外,制度逻辑视角和制度复杂性在解释国家内部区域制度变异方面同样有力。例如,Zhao 和 Yang (2019) 考察了中国不同省份新创企业绩效的性别差异,发现不同省份的特征体现为政府对市场竞争的干预和性别不平等的文化信仰的独特构型。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预力度大且性别不平等文化强烈的省份,女性创业者与男性创业者在职业和生活选择上存在系统性差异;她们选择进入低收益行业的可能性较大,参与下班后社交活动的可能性较小,而这两种活动对新创企业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这些例子所证明的,制度逻辑视角确实是一种概念化制度多样性 (institutional multiplicity) 的有力方法,能够捕捉各种制度秩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指导我们研究不同层级(如国家、区域的)制度变异对创业行动和结果的影响。

三、历史权变^①的制度与创业

与 Hitt 和 Xu (2019) 一致的是,制度逻辑视角假设制度不是静态的,而是历史权变的。但制度逻辑视角又超越了 Hitt 和 Xu (2019),认为制度的历史权变性不只是由于新法律的通过和规制的转变,还因为不同制度秩序显著性的变化及对其的解释和集体性认知的相关变化 (Thornton et al., 2012)。例如,现代社会通常更受国家、职业、企业 and 市场逻辑的影响。随着各国变得更加开放、民主和融入世界社会,

他们面临着推行促进自由市场、人和平等的政策的压力。特别是市场逻辑影响的显著性在过去 30 年中日益上升,这一点在对共同基金 (Lounsbury, 2002)、高等教育出版 (Thornton & Ocasio, 1999)、医疗保健 (Scott et al., 2000) 和社区银行业 (Marquis & Lounsbury, 2007) 等多方面的研究中均有体现。同样地,专业培训、高等教育以及对传授平等和人权的全球价值观课程的采纳也有所增加 (Meyer & Höllerer, 2010; Ramirez et al., 1997)。

相比之下,家庭等其他一些制度秩序的作用则可能已经在现代社会中消退或转变。例如,在北美洲,婚姻、离婚和出生率的显著变化重塑了家庭构成,改变了家庭成员的角色和关系;家庭变得越来越小,失去了许多以前的角色关系 (Aldrich & Cliff, 2003)。我们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也观察到类似的趋势 (China Daily, 2014)。此外,尽管社会现代化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信仰(例如父权制)可能是持久且难以从家庭和宗教的制度秩序中去除的。例如,即使在像日本和韩国这样——女性受教育普遍、投票权普遍,且有正式的反歧视法的国家,家庭和宗教中的父权制仍然支持着性别不平等 (Siegel et al., 2014; Zhao & Wry, 2016)。

这些具有历史权变性的制度模式对创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 Zhao 和 Yang (2019) 对中国女性创业者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一直在共同努力推动性别平等和提高妇女权利。结果,妇女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同时还被鼓励加入

^① 历史权变,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劳动力队伍。与这一大趋势相一致的是，女性创业者在获取诸如培训、网络和银行贷款等关键资源方面，也越来越与男性创业者不相上下。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些积极的变化，但在某些地区，女性创业者仍然面临着比在其他地区更强烈的性别不平等观念。事实上，有些人甚至认为现代性别歧视正在复苏，这反映在所谓的“剩女”现象中（即那些年近 30 岁但尚未结婚的女性受到强烈的污名化）。Zhao 和 Yang (2019) 认为，这种现代性别歧视的复苏对女性创业者追求和献身创业的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

我们同意 Hitt 和 Xu (2019) 的观点，即关注制度的历史演变对于研究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的创业尤为重要，因为这些经济体拥有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丰富的文化、强大但变化着的历史遗产，以及持久的价值观和信仰。制度逻辑视角有可能帮助我们识别与模拟同时影响创业者和塑造其企业命运的各种制度力量以及他们的动态。

四、创业研究中制度理论的情境化

与许多关于创业的制度研究一样，Hitt 和 Xu (2019) 聚焦于制度方面。事实上，关于创业的制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制度理论的应用，创业不过被视为另一种应用情境。虽然这一方法可以揭示创业现象，但我们认为在创业研究中进行制度理论的扎根和情境化，可以进一步推动创业研究中的理论建设并反过来丰富制度理论 (Zahra, 2007)。

创业为制度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情境。

正如 Hitt 和 Xu (2019) 所指出的，创业可以由新创企业进行，或是由成熟企业以公司创业的形式进行。新创企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通常缺乏资源和可追踪记录，且面临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Gompers, 1995; Li, 2008)。在提供资源和激励或施加约束方面，制度是否会对公司创业和新创企业产生类似的影响？此外，新创企业从想法的产生到想法的执行和扩展，通常会经历几个发展阶段？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创企业，什么样的制度组合是特别有利的？另外，在创业研究中，识别、创造和利用创业机会是创办新企业的核心 (Venkataraman, 1997)。在创造和发现创业机会方面，不同类型、层级和不同组合的制度是否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最后，在将制度理论应用于创业时，我们是否需要放宽一些假设？

在创业研究中情境化制度理论的另一条路径，是制度与创业之间的共同演进。目前许多关于制度和创业的研究，特别是在新制度经济学传统中，可被归为一种在约束条件下选择的方法，即制度常常被看作是既定的或稳定的，创业者在对创业战略和绩效施加约束的既定制度框架内运作。因此，创业者和投资者的行为及结果取决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及其相互作用 (Bruton et al., 2009; Iriyama et al., 2010; Klapper et al., 2006; Li et al., 2014; Li et al., 2017; Li & Zahra, 2012)。

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同的前提开始，即：制度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创业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结合这两方面，人们可能会问，制度是否以及如何塑造创业行为和创业发展，反过来，创业行为和创业发展是否也对制度有塑造作用。

例如,制度及制度变化如何鼓励或限制市场和企业向创业型经济和创业型企业转变?在美国,1970年风险投资还不盛行。1979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的“谨慎人”规则放开限制,放宽了对养老基金参与风险投资的限制,每年的投资轮数、获得融资的新创企业数量和风险投资总额都出现了大幅增长(Gompers, 1995)。同样,2012年通过的《创业企业扶助法》(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简称JOBS法案)也因促进了美国的众筹而广受认可。在中国等新兴市场,我们也看到了旨在促进创业和创业融资的制度变革。其中一个例子就是2009年中国创业板市场(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GEM)的诞生。创业板(GEM)类似于美国纳斯达克(NASDAQ),为中国高增长、高波动性的企业的股票提供了一个公共交易平台,这些企业尚未具备在上海或深圳主板上市的资格。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制度变革加速了各国的创业增长。

反过来,创业是否会促进和加速制度变革呢?如果是的话,又是怎样实现的呢?制度变革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过程(Arthur, 1989; North, 1990)。正如创业者往往是变革和创新的推动者一样(Schumpeter, 1934, 1942),创业是否也能推动企业、行业和国家各层级制度产生渐进的、破坏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革?新创企业在不同阶段的各种需求是否需要不同的制度或制度变革来满足?更广泛而言,创业如何塑造各层级的制度?探索 and 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增加制度和创业学者的双向交流,并实质性地促进制度与创业交叉领域的研究。

五、结论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Hitt和Xu(2019)的文章在帮助我们将注意力从之前过于简化的制度观点(例如,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三大支柱)转向制度多中心性概念方面具有明确的价值。我们也赞赏两位作者在讨论制度多中心性对创业研究的影响方面做出的努力。然而,主要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的制度多中心主义方法,对围绕制度逻辑和制度复杂性的大量研究关注不足,而这些研究的重点恰恰是制度多样性和多种制度秩序的组合和交互效应。事实上,秉承该传统的学者在解决Hitt和Xu(2019)提出的作为未来研究议程的部分问题上已经做了显著的工作。我们通过这篇评述展示了一种超越新制度经济学的更广阔的制度观。随着学者们对像中国这样拥有复杂且动态变化制度环境的国家的研究,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更深入的研究植根于社会学和组织理论的制度理论。

我们进一步观察到,目前创业中的制度方法是缺少情境化的。我们鼓励今后的制度研究与创业以及新创企业独特且丰富的背景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大量机会,可研究制度如何超越国界长期塑造创业发展,以及创业发展如何反过来影响制度。这种情境化的方法有望丰富制度理论,并为创业研究提供更多的见解。

接受编辑: Haiyang Li

收稿日期: 2019年4月27日

接受日期: 2019年5月1日

翻译：钟莹

校对：朱沆、秦昕、田莉、尹珏林

作者简介：赵雁飞（Eric Zhao），博士，印第安纳大学凯莱商学院创业与竞争企业杰出学者，管理与创业终身教授，并担任博士项目负责人。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战略管理、组织理论、制度理论、创新与创业、社会企业等。赵教授专注于结合最前沿的战略管理和组织理论来研究创新创业和社会企业相关的问题。他的研究成果获得过多个重要奖项，并已发表于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Organization Scie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Organization Studies* 等世界顶级管理学和创业学期刊和《南开管理评论》等中文权威期刊。他目前是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的客座主编，同时担任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和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编委。

李涌（Yong Li），博士，现任内华达大学商学院教授，Lee 创业讲座教授，Troesh 创新创业中心研究主任。他主要研究公司在不确定环境下的投资决策，包括创业融投资、众筹、创新和跨国投资等。研究成果发表于管理学主要期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以及创业主要期刊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目前担任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副主编，《管理学季刊》创业领域编辑，

以及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等主要期刊编委。曾担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战略创业教授，于伊利诺依大学香槟分校获得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参考文献

- [1] Aldrich, H. E., & Cliff, J. E. 2003. The pervasive effects of family on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a family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8: 573-596.
- [2] Arthur, W. B. 1989.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99: 116-131.
- [3] Batjargal, B., Hitt, M. A., Tsui, A. S., Arregle, J. L., Webb, J. W., & Miller, T. L. 2013. Institutional polycentrism,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and new venture growt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6: 1024-1049.
- [4] Bruton, G. D., Ahlstrom, D., & Li, H. L. 2010.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entrepreneurship: 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do we need to move in the futur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4: 421-440.
- [5] Bruton, G. D., Ahlstrom, D., & Puky, T. 2009.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A comparison of the venture capital industr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As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0: 762-778.
- [6] China Daily. 2014. Size of Chinese family getting smaller.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4-05/15/content_17508456.htm. Accessed on Apr. 15, 2019.
- [7] Cobb, J. A., Wry, T., & Zhao, E. Y. 2016. Funding financial inclusion: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con-

textual contingency of funding for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9: 2103–2131.

[8] Di Maggio, P. J., & Powell, W.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47–160.

[9] Greenwood, R., Raynard, M., Kodeih, F., Micelotta, E. R., & Lounsbury, M. 2011.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5: 317–371.

[10] Grimes, M., Williams, T., & Zhao, E. Y. 2019. Anchors aweigh: The sources, variety, and challenges of mission drif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Forthcoming.

[11] Hitt, M., & Xu, K. 2019.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Management*, 4: 1–14.

[12]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3] House, R. J., Hanges, P. J., Javidan, M., Dorfman, P. W., & Gupta, V. 2004. *Cultur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4] Iriyama, A., Li, Y., & Madhavan, R. 2010. Spiky globalization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The influence of prior human network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4: 128–145.

[15] Klapper, L., Laeven, L., & Rajan, R. 2006. Entry regulation as a barrier to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2: 591–629.

[16] Kogut, B., & Ragin, C. 2006. Exploring complexity when diversity is limited: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in theories of rule of law and national systems revisited.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3: 44–59.

[17] Li, Y. 2008. Duration analysis of venture capital staging: A real option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3: 497–512.

[18] Li, Y., Hernandez, E., & Gwon, S. 2019. When do ethnic communities affect foreign location choice? Dual entry strategies of Korean banks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2: 172–195.

[19] Li, Y., Vertinsky, I. B., & Li, J. 2014. National distanc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perform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 471–489.

[20] Li, Y., & Zahra, S. A. 2012. Formal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venture capital activity: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7: 95–111.

[21] Li, Y., Zahra, S., & Lan, S. 2017. Heterogeneity in new venture formation rates across nations: The schumpeterian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views. In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Manageri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World Scientific Reference on Entrepreneurship Volume 2).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1–35.

[22] Lingo, E. L., & O' Mahony, S. 2010. Nexus work: Brokerage on creative projec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5: 47–81.

[23] Lounsbury, M. 2002.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tatus mobility: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field of fin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255–266.

[24] Lounsbury, M., & Glynn, M. A. 2001.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Stories, legitimacy, and the acquisition of resour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2: 545–564.

[25] Lounsbury, M., & Glynn, M. A. 2019.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A new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processes and possibilitie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 Marquis, C., & Lounsbury, M. 2007. Vive la

résistance: Competing logic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U. S. community ban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799–820.

[27] Meyer, J. W., & Rowan, B.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340–363.

[28] Navis, C., & Glynn, M. A. 2010. How new market categories emerge: Temporal dynamics of legitimacy, ident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satellite radio, 1990 – 2005.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5: 439–471.

[29]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 Ostrom, E. 2005.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1] Ostrom, E. 2010. 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641–672.

[32] Ramirez, F. O., Soysal, Y., & Shanahan, S. 1997. The changing logic of political citizenship: Cross-national acquisition of women's suffrage rights, 1890 to 199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735–745.

[33] Schumpeter, J. A.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4] Schumpeter, J. 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35] Scott, W. R., Ruef, M., Mendel, P. J., & Caronna, C. A. 2000.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From professional dominance to managed car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6] Siegel, J., Kodama, N., & Halaburda, H. 2014. The unfairness trap: A key missing factor i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discrimina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37] Spillman, L. 2002. *Introduction: Culture and cultural sociology*. In L. Spillman, ed. *Cultural Soci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38] Swidler, A.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273–286.

[39] Thornton, P. H., & Ocasio, W. 1999.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historical contingency of power in organizations: Executive success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industry, 1958–199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801–843.

[40] Thornton, P. H., Ocasio, W., & Lounsbury, M. 2012.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1] Venkataraman, S. 1997. The distinctive domain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Katz, J. A., ed. *Advances in entrepreneurship, firm emergence and growth* Greenwich, CT: JAI Press.

[42] Zahra, S. A. 2007. Contextualizing theory building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2: 443–452.

[43] Zhao, E. Y., Fisher, G., Lounsbury, M., & Miller, D. 2017.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Broadening the interface between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8: 93–113.

[44] Zhao, E. Y., Ishihara, M., Jennings, P. D., & Lounsbury, M. 2018.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in the console video game industry: An exemplar-based model of proto-category evolu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29: 588–611.

[45] Zhao, E. Y., & Lounsbury, M. 2016. An institutional logics approach to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Market logic, religious diversity,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 by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1: 643–662.

[46] Zhao, E. Y., & Wry, T. 2016. Not all inequality is equal: Deconstructing the societal logic of patriarchy to understand microfinance lending to wome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9: 1994–2020.

[47] Zhao, E. Y., & Yang, L. 2019. 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 Examining the gender gap in the privately owned Chinese ventures. *Indiana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